

# 经济学范式革命 的一种方法论模式和假说

杨建飞

**摘要:** 论文提出了经济学范式革命在方法论上的一种模式和假说,认为经济学范式革命是在哲学本体论的启蒙、引导下,经济学家认识到旧范式的不足和局限,选择出新的有意义的战略方向和课题;从一定的价值标准和意义标准出发,选择、建构出与自己的战略方向相关的具有认识论意义的经验事实和理论问题;选择和创建出与自己所研究经济事实和经济过程相一致的、相和谐的数学工具,作为认知结构和创新手段;觉识、构想、设定一个在逻辑上自洽的、在经验上具有丰富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的范式(研究纲领)的“硬核”(基本假设),从而引起经济学范式革命和转换。对新的基本假设的反驳、批评和检验,推进着新的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深化和发展。

**关键词:** 经济学范式 革命 方法论 假说

经济思想史研究显示,经济学范式革命和思想创新是经济学思想演化中的重大事件和典型状态,其中蕴含了丰富的经济思想、经济哲理、方法论及创新模式等方面的意义。揭示经济学范式革命的思想机理和方法论特征,无论对于促进经济学思想进化、提高学术范式的解释能力,改进经济学研究现状,还是发现、选择新的经济学增长点都有重要意义。哈奇森说:“研究经济学的较重要变革、转折点或革命,有助于说明这门学科将来合理期望的发展,有助于说明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我们期望它提供一些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

通过对于经济思想史上的典型案例的归纳、分析和思考,以科学哲学、认识论、知识论、方法论为背景,本文尝试性地提出一种西方经济学范式革命和转换的方法论模型和假说。

## 一、哲学本体论的启蒙和引导

经济学的认识主体有两种,一是自由的、个人主义的经济学家。二是经济学共同体(按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解释,科学共同体是团结在科学范式周围,并与范式共进退、共存亡,基本观点相一致的科学家群体。经济学共同体就是坚持并维护同一个经济学范式的经济学家群体和团队。经济学共同体的典型形态是经济学学派)。分析显示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共同体(学派)的认识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宏观知识背景中,以一定的经济世界的本体论预设、哲学信念为基

本框架和引导,通过对于经济事实和基本素材的技术性、创造性的处理及组织而进行的。对称性、完全性(不完全性)、简单性(复杂性)、和谐性、完备性、演化性、稳定性等哲学信念和本体论预设是经济学方法论框架中不可替代、不可缺少的内生部分。同时,哲学信念和本体论预设作为经济学思维活动在逻辑程序上的战略制高点,表现为经济学家共同体对于经济世界和经济图景的基本要求、判断和态度趋向。哲理思维的总体性、批判性、超越性等特征往往使其能成为经济学家思维活动的宏观调控中心,并能为克服日常具体分析和实证研究中的逻辑-实证型思维的局限,打破思维自身的惯性、惰性和教条化倾向提供重要的启迪和帮助。同时,这种哲学信念、本体论预设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有所不为”的思辨努力,也有益于增强经济学家经济思维活动的洞察力、创造性,并识别旧范式的不足和局限,提高他们学习、适应新环境和辨别新问题的能力,给经济学研究和思维指出最有意义的课题和最有希望的研究战略方向。

例如,在古典经济学革命中,亚当·斯密深受当时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哲学和伦理学的影响,相信自发的个体力量的第一性,引入了牛顿科学哲学中自然秩序的假说,抛弃了中世纪《圣经》的善行和利他主义的经济学基本假说(他认为《圣经》中的“伦理人”的假说并不是没有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只是不符合经济学的效率最大化、理性化的视角和原则)。

在此基础上,斯密提出了“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作用下的“市场出清”假说。在新古典学派的“边际革命”中,马歇尔、庞巴维克等人批判了李嘉图等人的绝对的劳动价值原则,分析了绝对不变的价值的不可能性和不可观测性,实现了经济哲理信念上的转变,改变了古典学派对于经济事实和经济世界的基本观点和本体论假说,从而把目光转向可以观测,可以计量的价格和均衡价格,进行了边际革命前的卓有成效的思想方法论的转向和哲学批评及精神启蒙。在凯恩斯革命中,凯恩斯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最后放弃了市场完美无缺的神话和理想主义经济教条,否定了萨伊定律,认为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非自愿失业,整个市场存在需求不足。

## 二、各种经济学问题和事实的发现与选择

经济学家经哲学启蒙和自我批评,从一种被教条化的旧研究范式和框架中解放出来,实现方向调整和方法论转移,进入另外一种情境和领域,从事另外一种范式和纲领的创建工作,接着,他的研究活动的后续环节和首要任务就是收集、选择并建构为自己研究课题所亟需的各种具有认识论意义的经验事实和理论问题,建立一个与自己的战略选题和方向相关的、有效的、有意义的、相对充分的事实-问题集合。

我们认为,在经济学范式革命的第二步骤和环节中,哲学观念、本体论预设等宏观调控型思考和方法论讨论的主要任务不再是启蒙、开化、引导经济学家的思维活动,而是发生了功能转换和目标转移。经济学方法论的直接目标此时已转换为给经济学家共同体提供一个寻找、选择、建构各种事实(包括实验经济学和认知科学意义上的实验事实及其他经验事实、历史事实、现实事实等)和问题(包括理论问题、逻辑问题、猜想型问题等)的意义标准和价值标准。马克·布劳格说:“方法论能够做的是,提供接受或反对某种研究框架的准则,制订帮助我们区别鱼目与珍珠的标准”。

经济学范式革命和重大创新的思维活动除需基本框架和宏观调控体系的引导、各种背景知识的衬托和哲学信念的启蒙、开化外,它还必须以各种观察、陈述、经验材料等事实和不同定理之间的关系,整个理论的逻辑结构等方面的理论问题为基础,否则经济学思维和范式革命就会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罗宾斯说:“经济学命题是从各种先决条件中推演出来的结论,最主要的条件是以某种方式涉及一些简单的、无可争辩的经验事实”。

十分明显,并不是现有的和经济学历史上的所有经济事件、经济学事实和理论问题都能够有资格

和机会成为经济学家本人的当期和当前的思维对象。事实上,经济学家或经济学共同体是以某种自我确认和自愿接受的意义标准和价值标准为出发点和基本尺度去收集、选择、建构自己所感兴趣的经济学事实和理论问题的。意义标准和价值标准共同规定着经济学事实和问题的范围、地位和重要性,而且在不同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共同体那里,它又具有某种私人性、非理性和时代性。经济学家正是在获得特定的意义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确认后,才去确定什么事实和问题是自己真正需要的,有价值的,而什么则不是。哪些东西可以暂时放置起来或通过增加特设,变更有关初始条件、边界条件而应付或暂时解释过去,哪些则不能。经济学史表明,那些不能与经济学家本人的价值标准、意义标准、选择标准发生联系的、无限多的经济学事件经验事实、理论判断、理论体系自身的逻辑推理困难等,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理性的不完全,由于不能被经济学家或经济学共同体的意义标准和价值标准所认同,因而,它们对于思维活动来说是无实际作用的。经济学家永远在一个自己认可并选择建构起来的、有限的事实和问题空间中,依托思维的无限的创造力和逻辑推理而展开工作。

例如,在凯恩斯革命中,凯恩斯本人收集了与古典经济学不符的事实:如非自然性失业,货币政策作用的微不足道,货币需求无限大的“凯恩斯陷阱”,大量的商品库存和积压,经济总量的失衡,消费不足等(历史上早已被马尔萨斯等人预言到)。十分明显,这些事实历史上也有过,但是分散的、零碎的和互不关联的,而凯恩斯的独特之处是按自己的研究的战略方向要求和意义标准,将它们选择并集成起来以应备用,并努力寻找这些经济事实之间的逻辑一致性,其后面的规律性。对此正如科学哲学家库恩所说:“哲学范式和意义标准的变化,使科学家们在过去看过的地方看出新问题”。我们认为,正是通过这种以价值标准和意义标准为尺度的收集、分析、选择、建构工作,一个作为经济学家工作平台和基础的、真正的认识论意义上的、经济学有效的经验事实和理论问题集合才能被确定,经济学的范式革命才有了客观基础。

## 三、作为认知结构的数学工具的选择

在经济学范式革命和理论创新等经济学的创造性思维活动中,哲学信念和本体论的启蒙、开化、引导,价值标准和意义标准的觉识,新的经济学事实-问题集合的收集、选择和建构,只是范式革命和理论创造的背景准备和“硬件”型素材准备,到此,建立理论模型、寻找因果关系、对于事实和问题进行相关性

分析成为整个认识活动和方法论上的关键。为此,经济学家必须找到或创造出适合于特定的经济情景和经济事实 - 问题集合要求的数学理论,并以此作为信息加工、逻辑分析、处理问题的手段,作为认知结构和认知工具,最终达到优化并组织已有的经济学事实和问题。这时,经济学家首先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路线,从现有的经济学事实 - 问题集合出发,在已有的数学理论库存中寻找、选择出与经济图景匹配、适合的数学理论和结构。如果数学理论中没有能符合现期经济模型和经济图景需要的理论分支,他就必须创造出新的数学理论用以组织、整合、框定、模型化已有的事实 - 问题集。

经济学方法论研究表明,数学理论及由其转化而来的数学方法并不仅仅为经济学或经济学共同体的范式革命等创造性思维活动提供了一种量的计算手段、逻辑推导和演算的技术性工具,更为重要的是,它为经济学新概念和基本假说的确立提供某种类似认知结构的认识工具和认知图式。经济学范式革命中数学工具的作用与康德哲学,皮亚杰的儿童心理学,现代认知科学中关于时空、因果、必然性等范畴在普通认识中所起到的结构、框定作用是相似的。没有合适的数学理论的提出和确立,任何经济学概念和原则都将因为没有容纳的框架和整合的工具和结构而无法建立,任何一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都将停留在凌乱的问题 - 事实集前而不能前进,这时,经济学范式革命和理论创新根本是不可能的。数学理论及其方法在经济学范式革命、理论创新甚至日常的经济学思维活动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总结科学方法论的作用和意义时,著名量子力学家狄拉克深有体会地说:“数学是特别适合于处理任何种类的抽象概念的工具”,“我本人思路实际上是把重点放在能用方程式表达部分的思想”,这无疑是一位富有哲学思想的物理学家对数学方法重要作用的深刻体验。对于经济学的范式革命无疑也是适用的。杰文斯说:“我主张,一切科学的经济学家皆须是数理的经济学家,因为经济学家研究的是经济量及其关系,一切量与量的关系皆属于数学,……数学的推理是必要的”。

英格罗和伊斯雷尔(IngraoandIsrael,1990)通过对一般均衡理论数学化的历史考察以及数学与物理学相互影响的现实分析,发现数学化并不是理论的一个特征,而是理论创造和理论发展的基本原因之一。数学化推动理论创造和理论发展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如德布鲁(Debreu,1991)指出的那样,数学是一个需求大师,它不断地要求更弱的假设,更强的结论和更大的一般性,采用数学形式就迫使经济理论满足这些要求并迫使研究采取简单的

形式;第二个方面是数学由于能够使直觉变得十分清晰并能够发现与直觉相反的特殊情形,结果是诱发新理论的产生,例如在数学分析特别有效力的金融学领域,数学模型刺激了有关新金融工具理论的建立。

例如,在“边际革命”中,新古典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取决于他们发现并选择应用微分这种恰好可以准确刻画成本、收益、效用等经济变量动态变化的数学工具。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分析立足于当时已经成熟的微分方程组理论之上,后来阿罗 - 德布鲁的更为严格的证明工作则是以现代拓扑学的不动点原理为基础的。

#### 四、对新范式和研究纲领“硬核” (基本假说)的觉识和设定

从思维创造学和发生学角度来看,在经济学的范式革命和理论创新中,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其根本任务在于构想并提出一个自足的、在逻辑上自洽的、能解释已有经济学事实和问题,有丰富的信息内涵、有能力预测新现象并引出新问题、在理论和经验两方面都进步的、有前景的研究纲领。在此,经济学范式革命成功的关键在于综合应用各种科学方法(如归纳、类比等),发挥思维的自由性和创造性,觉识并建构提出一个比原有范式更有竞争力的、能结束经济学范式革命前的各执一词、相持不下的不确定的盲目局面,给整个经济学研究活动以统摄、引导和方向的新研究纲领的“硬核”,即一组基本假说。一个具有更为广泛解释能力、解题能力、竞争能力和进步性的研究纲领(框架)的“硬核”和基本假设的提出,标志着经济学范式革命和转换的基本完成。从此以后,对于新的基本假设的检验、维护、批评和反驳,促进了经济学作为常规科学的“解难题”(库恩语),从而推进了经济学新范式和框架的成长、深化、丰富和发展。

按我们理解,在经济学范式革命和重大理论创新中,从方法论角度,当经济学家接受了一定的哲学信念和本体论假设,收集、选择并建构出一个有意义且有效的经济学事实 - 问题集合,找到或创造出了与特定的经济学事实 - 问题集合及经济图景相一致配套的数学理论后,他的根本任务就转变为利用包括数学方法在内的各种操作方法(如归纳方法、类比方法、模拟方法、假设方法等),对已有的事实和问题进行组织、加工、序化,充分发挥思维的艺术性、创造性(如直觉、想像、顿悟),构想或猜想出作为整个经济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中心的“硬核”,即一组基本原理和基本假说。

例如,在凯恩斯革命中,在经过哲学转向,凯恩

斯意识到市场机制的不完全和其局限性后,在市场不完全性的信念引导下,凯恩斯收集了市场失效的例证,研究了微积分等数学理论,最后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基本假说,并以三大需求(消费需求、投资需求、货币需求)不足假说为“硬核”,推进了整个研究工作。后来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在凯恩斯的基本假设的引导下,在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争论中,通过对基本假设的检验、拓展、批评和反驳,推进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深化、完善与发展。货币主义革命中,弗里德曼同样认识到了国家干预的内在弊端,收集了大危机等历史事实(他不同意凯恩斯对大危机的解释,认为大危机根本上是由于政府干预失误和银行体系失败所致,从而把大危机转化为有利于货币主义的事实和证据),收集了现实经济生活中的“滞胀”、资本积累的下降趋势(过度消费)等现实事实,最后提出了货币最重要的基本假设作为“硬核”,给相关的研究工作以中心和基础。在新古典宏观综合派和公共选择派等理论经济学范式革命中,基本假设和“硬核”同样是这样构想并提出来的。基本假说和范式一旦提出,必然会结束当前研究中存在的盲目性和高度风险状态,使得整个研究活动的力量得到协调、组织,推动了整个研究的深入和专门化,从而完成了经济学研究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

觉识、构想、设定整个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和基本假说,是整个经济学范式革命和转换中思维活动最富有创造性、艺术性、价值性的关键一步,是经济学要素投入-产出运行机制中贡献额度最高并决定成败的一环,应引起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和选题的高度重视。

## 五、方法论的模式和假说

我们认为,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侧面,那些能触动整个经济哲学信念、经济学框架和经济学图景的经济学范式革命和经济学重大理论创新的方法论模式是:经济学家因接受哲学信念和本体论承诺对旧理论不足及局限的批判后,思想受到启蒙而放弃旧理论中已经成为教条的部分,然后从战略上确定自己的新的战略方向和选题领域,以一定时代的科学哲学成果和经济学共同体的共同约定作为价值标准和意义标准,收集、选择并建构出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经济学事实-问题集合,选择或创造出一套能适应于特定的经济图景要求的数学理论并辅助以其他逻辑方法(如归纳方法等),通过对于经济学事实-问题集合的分析、加工、整合和组织,充分发挥思维的艺术性和创造性,经大胆想像,建构并设定出能统摄当前和当期研究的新理论的“硬核”(一组基本假

设)。同时,尽可能使基本假设数目减少到最少并保持其在逻辑上的独立性、相容性和整体思想上的统一性、完备性。相对论等科学革命的基本认识环节和机理一直是科学方法论的重大问题,引人入胜,对此玻恩评论说:“广义相对论是人类思考自然的最伟大的成绩,它是哲学领悟、物理直觉和数学技巧的惊人结合”。这种评价虽然不很全面,但无疑是很深刻的,也适合于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描述以现代数学、物理学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的范式革命和理论创新的方法论特征。

## 六、对于西方经济学前沿进展和方向的方法论思考

在新的世纪开始的时候,人类科学思想和范式正在发生变化。现代耗散结构理论、混沌理论等自组织理论提出了研究自组织性、复杂性、偶然性、不可逆等问题的重要性,它代表了当代科学思想的另外一种趋向。对此,以简单性、可逆性、统一性为思想偏好的牛顿科学思想及爱因斯坦的科学思想并未给出解释。以数学及力学为模板和基础的新古典学派等主流经济学也未曾从经济世界和经济学的角度给予充分注意。这不能不说是近代科学自然图景观和经济学秩序观上的某种历史局限。为此,普里高津批评了爱因斯坦自然图景中的极端还原性、统一性、简单性、必然性趋向。他说:“我们必须承认有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混沌科学最热心的倡导者、美国海军部科学政策官员施莱辛格说:“20世纪科学家将永远铭记的只有三件事:相对论、量子力学与混沌”。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认为,“许多科学家突破过去时代的老框架,坦率地放弃了他们的培根-笛卡尔-牛顿主义遗产,拒绝机械论而倾向于有机论。在现代科学中呼唤一种奠基于非决定论、非连续性、混沌、复杂性和熵的后现代转换。这些后现代科学就倡议引导出一个结论,即一种新的范式是必要的,这种范式在哲学上将会是更加深思熟虑的,在科学上是更复杂的,对伦理科学是更敏感的,在生态学上是更健全的”。这些不同背景的专家的批评性的共识,是很引人深思的。

历史上,力学及物理学对经济学有着重要的思想和方法论影响。科学思想的变化应特别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关注和重视。根据我们关于经济学范式革命的假说和结论,哲学思想和本体论承诺在科学理论创新及范式革命中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启迪、调控作用。我们现在和未来应该接受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图景观和哲学信念作为经济学思维的宏观调控体系,才能使我们的思维更合理,决策更有利于未来的经济学潮流和信息化、生态化、柔性化的社会经济

现实,这无疑是一个引人瞩目的问题。美国金融经济学家埃德加说:“用均衡理论来给远离均衡状态的系统制定模型的经济学家们往往得出靠不住的结果”<sup>⑩</sup>。马克·布劳格评价说:“我们看来正在进入一个相互抗衡的研究框架太多而不是太少的时代……许多抗衡的科学研究框架的基本特征是提出有关现实世界的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不同的问题……经济学方法论不可能告诉我们这些抗衡的研究框架在未来岁月中,哪一个最可能对经济运行的重要知识作出贡献”<sup>⑪</sup>。马克·布劳格无疑认可方法论上的多元主义趋向。

目前非平衡自组织理论所提出的复杂性、有机整体性及演化的自然图景和方法论极有可能作为当代和未来经济学的重要的哲学思想、本体论假设和方法论准则。新古典学派所遇到的困难也可能说明古希腊以来的过分追求简单和统一的思想信念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主义和机械力学主义的方法论已经走到尽头,并且不适用于未来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精神。这些问题无疑非常值得深思并富有挑战性。正如科学哲学发展中,从逻辑(理想)主义走向历史(真实)主义的战略转向一样,经济学目前正在超出新古典的理想主义,走向历史主义和真实的现实主义。目前,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超越了新古典的理想主义模型,关心一个真实企业的运行和一个真实经济系统的演化,关心复杂性和非线性,形成了西方经济学中进化博弈论的重要前沿方向,具有明显的哲学方法论意义。布赖恩·斯诺登预测:“真实经济周期的模型很可能被更多地整合进入主流经

济学”<sup>⑫</sup>。这无疑预示着经济学思想上的一个多元化的前景。

#### 注释:

哈奇森:《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中文版,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⑫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中文版,280、27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莫利斯·罗宾斯:《方法论、政策和现代理论》,见沙克尔顿、洛克斯利:《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中文版,19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文版,79页,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4。

周林东:《科学家论方法》,78~161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

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文版,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玻恩:《我这一代物理学》,中文版,12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普利高津:《从存在到演化》,中文版,30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美国科学、工程和公共政策委员会编:《科学技术的前沿技术展望》,中文版,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转引自黄润生:《混沌及其应用》,3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转向》,中文版,293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⑩埃德加:《资本市场的混沌与秩序》,中文版,3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⑫布赖恩·斯诺登:《千禧年的宏观经济学:存在一种共识吗?》,见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文:《与经济学大师对话:阐释现代宏观经济学》,中文版,10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西安 710069  
(责任编辑:Q)

(上接第69页)

8. 蔡昉、都阳:《中国地区增长的趋同与差异》,载《经济研究》,2000(10)。

9. Barro, R. and Sala-i-Martin X., 1995. Economic Growth. London: McGraw-Hill.

10. Bell, R. M., 1984. “Learning”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Capac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Fransman, M. and King, K., eds., Technological Capacity in the Third World. London: Macmillan.

11. Freeman, C., 1991. “Networks of Innovation: A Synthesis of Research Issues.” Research Policy, Vol. 20, pp. 499-514.

12. Hirschman, O., 1958.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3. Humphrey, J. and Schmitz, H., 2001. “How Does Insert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s?” Research Paper,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University of Sussex, Brighton.

14. Krugman, P., 1991.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9, No. 3, pp. 483-499.

15. Lal, S., 1992.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Industrialization.” World Development, Vol. 20, pp. 165-186.

16. Lucas, R. E., 1988.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22, pp. 3-42.

17. Myrdal, G., 1957. 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 London: Duckworth.

18. Romer, P. M., 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4, No. 5, pp. 1002-1037.

19. Romer, P. M., 1990.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8, No. 5, pp. 71-102.

20. Romijn, H., 1999. Acquisition of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in Small Fir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ondon: Macmillan.

21. Solow, R. M., 1956.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70, pp. 65-94.

22. Swan, T. W., 1956. “Economic Growth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Economic Record, Vol. 32, pp. 334-361.

23. Stewart, F. and Ghani, K., 1991. “How Significant Are Externalities for Development?” World Development, Vol. 19, pp. 569-594.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Q)